

中国南方民族史纲要

西南民族史纲要

中国的西南民族地区，包括云南全省、四川省西部与西南部、贵州省西北部，基本上属于云贵高原。这一广大地区，有众多高山和大川，地势高而纬度低。因而同一地区在不同地势高度上气候与生态条件有明显差别，但总体上说，各不同高度的气候与生态条件，均适合人类生存发展。西南土著起源非常古远，西北族群往西南迁徙及东南族群往西南迁徙，都在西南民族形成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众多民族屡经迁徙和交错分布，民族间相互影响、吸收与涵化，并且民族分布随地形不同高度层面而有不同特点，出现了民族与文化在同一地区呈不同地势高度分层垂直分布的奇观。又由于山河阻隔，交通不便，往往出现同一起来源的族群，分布到不同地区，形成为不同的民族；不同来源的民族成分，在同一地区长期交往，却产生民族认同或族系认同。这种情况，尤以云南各民族在历史与分布上表现突出。

当代以西南为主要聚居区的少数民族有彝、白、纳西、傈僳、哈尼、拉祜、基诺、阿昌、普米、怒、独龙、羌、景颇、傣、佤、布朗、德昂 17 个民族。此外，还有藏、回、壮、侗、苗、瑶等民族，也有较大的聚居区；还有少量蒙古族从元代定居于云南，至今仍保持小块聚居地点。

元谋人、桐梓人等远古人类及旧、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证明西南地区是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先秦，西南地区的族群已与楚、巴、蜀乃至黄河流域发生了多层次联系；

秦汉开发西南，正式设置郡县，西南地区纳入统一中国的版图。以后历经分裂与统一的历史演变，唐宋时期，还出现过以彝族、白族先民为统治民族的南诏和大理两个西南边疆王朝；傣族先民也建立过景陇金殿国和勐卯国。虽然如此，西南各民族的历史，始终没有脱离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基本方向，为开发祖国的西南地区和缔造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一、西南夷

（一）西南夷的起源与分布

1. 起源

西南夷是对巴蜀以西以南地区各民族的总称，包括了众多不同的氏族、部落和民族，他们聚居或相互杂居在一起，共同为开发祖国的西南地区做出了贡献。

“西南夷”一名始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继后《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均有专传，而且记述越来越丰富。《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牂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嵩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①从记载中看出，西南夷分布地域广大，族类十分繁杂，有的族属和来源纷繁难辨，既有来自羌人南迁的成分，又有百越和百濮往西南迁徙的成分，更有的是汇融了当地的土著。根据对西南夷进行多学科的研究结果，西南夷大体源于氏羌（藏缅语族）、百越（壮侗语族）、闽濮、髯濮等（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3个族系。

^①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 116。

属于氏羌族系的民族有滇、靡莫、劳浸、僰、嵩（叟）、昆明、邛都、徙、笮都、冉駹、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祜、哈尼、基诺、傈僳、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

属于百越族系的民族有夜郎、且兰、句町、漏卧、滇越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仡佬、侗、水、布依、壮、傣等民族的先民。

属于闽濮、躲濮族系的民族有闽濮、躲濮、哀牢、苞满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先民。

凡属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相近的经济文化生活，而且共同的特点越往上溯，相同之处越明显。这些西南的古代民族，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纷纷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2. 分布

西南夷分布的大体方位和区域如下：

夜郎。主要分布区域在郁江上游北盘江流域，即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至云南省东部及广西西部连接地带。

滇。即楚顷襄王时^①庄蹻王滇的地区。滇的中心地区在今云南省滇池周围，包括云南省曲靖市往南至红河北岸，往西至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

劳浸、靡莫。据《史记》云在滇“东北有劳浸、靡莫”。故劳浸、靡莫应在今昆明市以北的寻甸、东川、昭通、镇雄等市县之内。

邛都。据《汉纪》记载：“自靡莫以北君长什数，邛都最大。”^②《史记》又云邛都为越嵩郡，故邛都古为越嵩郡之地，即今四川省西昌市一带。

嵩、昆明。据《史记》记载：“自桐师以东，北至牂榆，名为嵩、昆明。”桐师即古之永昌，今云南省保山；牂榆即今之洱海地区。故嵩、昆明族的分布地应在今保山东北和大理洱海地区。

^① 关于庄蹻入滇的时间，《史记》、《汉书》记为楚威王时，《后汉书》记为楚顷襄王时，今从《后汉书》。

^② 荀悦：《汉纪·西南夷》。

徙、笮都。据《史记》记载邛都以北为笮（笮）都，《史记集解》徐广云“徙在汉嘉”，《史记索隐》韦昭云“徙县属蜀”^①。故徙、笮都在邛都以北蜀郡以西的汉嘉郡，应在今之四川省西昌市以北至雅安市以南的广大地区。

冉駹。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国地也”^②。故冉駹族分布地应在今四川省西北的茂县、汶川、松潘等县地。

白马。在冉駹以北，“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氏”^③；或曰白马种……武都羌是也”^④。汉在武都羌地设武都郡，汉时武都郡在今四川省西北至甘肃省南部武都县地区，此即白马的分布区域。

句町、漏卧。此二族与夜郎是近邻，故知句町分布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西林、隆林、田林与云南省接界的广南、富宁等县地；漏卧分布在今贵州省兴义县往西至云南省的泸西、丘北、广南等县地。

且兰。汉武帝时唐蒙出兵南粤（越）所经之地，离牂牁江较近，故其分布地应在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都匀市以北至贵阳市附近。

哀牢、濮。哀牢夷分布地甚广，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⑤。包括今云南省保山、德宏地区，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游，南至云南省凤庆、临沧、西双版纳及其以南地带。

滇越。据《史记》记载在嵩、昆明族之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故知今云南省德宏、腾冲等地即是滇越族的分布地。

摩沙。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定笮县（今四川省盐源县）有摩沙夷，故知摩沙夷分布在今四川省盐源县以西至云南省宁蒗、丽江等县。

3. 发展

西南夷各民族在秦汉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这是因为秦汉时期

①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 116。

②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 116。

③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 116。

④ 《后汉书·西羌列传》卷 87。

⑤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 4，成都，巴蜀书社，1984。

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增多了。秦汉王朝又不断的对西南夷地区进行开发，特别是汉朝曾大规模的开拓，从公元前 135 年唐蒙招降夜郎始至东汉末，先后在西南夷地区建立了牂牁、犍为、益州、越嶲、汶山、沈黎、武都、永昌等 8 个初郡，并推行了一系列的初郡羁縻统治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加强了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而且将内地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传到了西南夷地区，促进了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1) 社会经济的发展

滇国内的僰族社会经济发展最快，农业是其主要的经济部门，普遍使用青铜农具从事锄耕农业生产，在滇池周围开垦出“肥饶数千里”的耕地。手工业生产有冶炼、玉石器制造、制陶、纺织、编织、漆器制造、皮革制作等行业。所制青铜生产工具和武器有斧、锄、凿、削刀、镰刀、锯、剑、戈、矛、钺等。所制生活用具有釜、壶、尊、杯、勺等。还能制作乐器编钟、铜鼓以及金银玉石等装饰品。商业上，秦时巴蜀商人就到“滇国”进行交易。汉时关中和巴蜀商人又将姜、丹沙、铜、铁制品运往滇国，以交换滇国的牲畜和僰僮，从而繁荣了巴、蜀、关中与西南地区的贸易。

除滇国的僰族以外，邛都、笮都地区的叟族、昆明族、摩沙夷的社会经济也在发展，这些民族大多以农业生产为主，史载邛都“此皆魍结，耕田，有邑聚”^①。“邛都夷者……其土地平原，有稻田。”^②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很早就进行了铜、铁、盐矿的开采，《华阳国志·蜀志》云：“台登县（今四川省冕宁、喜德两县间）……山有礬石，火烧成铁。”又云“定笮县（今四川省盐源县）有盐池”。1976年曾在西昌市南螺髻山发现古代铜器窖藏，内有王莽货泉、钱范、铜锤、铜锭等。^③商业上巴蜀商人常到邛、笮地区“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④。邛、笮各族与内地已有频繁的经济

①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 116。

②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 86。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 3，成都，巴蜀书社，1984。

④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 116。

交往。

夜郎各族已是“耕田，有邑聚”，其耕作技术是“畚山为田”的刀耕火种方式。

哀牢各族，“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可知其农业生产已具有一定的水平。手工业方面是“知染采文绣”，能纺织白叠、兰干细布、桐华布多种，且知染色、刺绣，并能开采冶炼金属和制造装饰品。在商业上，蜀商曾将哀牢各族所织的白叠、桐华布贩运内地和身毒等国，并将身毒等国的琉璃、光珠、蚌珠等装饰品带回哀牢各族地区，说明哀牢各族的贸易开始发展起来了。

(2) 社会与政治的发展

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发展较快的已经进入奴隶制，如僰族及邛都、夜郎等族。发展较慢的尚处于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如滇越等。发展最慢的仍处于原始阶段，如嵩、昆明夷。

较早进入阶级社会的是滇国境内的僰族。大约在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僰族的奴隶制社会就已形成。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墓葬中的许多文物都反映了僰族奴隶制的面貌，许多出土的贮贝器上都有反映战争捕捉俘虏为奴隶的场面，有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牧业和手工生产的场面，有奴隶主惩罚奴隶的场面。^① 从许多史料的记载和考古资料说明，僰族的奴隶社会内部出现了三个阶段：奴隶主、平民和奴隶。奴隶主贵族不参加生产劳动，只指挥掠夺战争、主持祭祀和监督奴隶生产，生活“豪奢”。平民从事农牧业生产，但必须向奴隶主贡纳。奴隶的地位极低，他们在奴隶主的皮鞭下进行各种生产，和牛马一样可以随意受到奴隶主的虐待、买卖和屠杀。^② 滇国僰族的奴隶制到公元 1 世纪以后，由于受到中原汉族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同时也因自身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迅速衰落，到公元 2 世纪至 4 世纪时僰族奴隶制便被后起的“大姓”、“夷帅”封建主所取代。

邛都、笮都地区，大约在公元前 2 世纪以来社会内部发生了财

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39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

^② 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41 页图 11，42 页图 12。

物占有不均和占有奴隶的现象，贵族之间发生了掠夺财物和奴隶的战争，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步确立。到公元前 1 世纪末，邛都、笮都的奴隶制又有发展，出现了在政治上有实权的大奴隶主——豪帅，史载“邛之初有七部”，即七个大奴隶主集团。这些豪帅“放纵，难以制御”。长贵就是邛都各部中最大的奴隶主，在公元 1 世纪曾起来杀了越嶲郡太守，自立为“邛穀王”，领太守事。公元 38 年（东汉建武十四年）授长贵越嶲太守印绶，统治邛都地区长达 20 年之久，反映出邛都各部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主集团的强大。

夜郎、句町、漏卧等族也已进入阶级社会。大约在公元前 2 世纪夜郎即已出现世袭酋长，并“有精兵，可得十余万”。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兵力，可以对周围小部落和人民实施一定的权力。夜郎及周围的且兰君、句町王、漏卧侯、同并侯等诸部之间不断发生掠夺人口和财物的奴隶制战争。但这些部族的奴隶制因素在萌芽时期就受到中央王朝——汉朝的限制，从而遏制了这些部族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夜郎等部族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尚未形成就开始向封建领主制社会过渡了。

西南夷中除上述滇国僰族、邛都、笮都、夜郎等族的社会生产关系发展较快外，其余的部族多数处于正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如滇越（掸）、哀牢等族都正向阶级社会的门槛跨进。另外有的部族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如僇、昆明等族还过着“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经济生活。

（二）南中夷帅大姓的形成与发展

1. 形成

大约在公元 2 世纪末到 4 世纪，西南夷各民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从称呼上将川西南、黔西北及云南称为南中地区，同时又出现了两大地方政治势力——夷帅和大姓集团。夷帅、大姓势力在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期间在西南夷各族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各族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夷帅，又称为“叟帅”、“叟大帅”、“夷率”，顾名思义是各民族中的贵族。他们是由原西南夷中数十百个君长、王、侯发展而来

的，拥有一定的实力。如越嵩郡夷帅（叟帅）高定元据有越嵩郡，拥有大量部曲（私人武装），朱提郡武茶夷帅于陵承势力亦很大。夷帅中有的和大姓相融合后成为雄踞一方的封建领主。

大姓一名，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的夜郎条：“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大姓是在东汉末年至两晋时乘中原混战之机形成的，是从秦、汉以来不断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秦汉以来不少民屯和军屯官吏及士兵在西南夷地区安家落户，经过不断与当地民族的融合和阶级分化，逐渐拥有管理屯政的权力侵占屯田，开垦私田，拥有大量土地，同时又掌握了管理盐、铁的权力，并将其掌握的盐、铁权作为发展政治势力的物质基础。这些移民中的掌权者又将大批要求“庇护”的流民或当地民族沦为部曲（私家武装，平时生产、战时打仗的农奴），并让其服定期劳役和打仗。这些移民中的掌权者就逐渐形成为雄踞一方的豪族大姓。

2. 发展

夷帅和大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越到后期联系越密切，区别越来越不明显。可以说大姓是夷化了的汉人移民贵族；夷帅是汉化了当地的当地各民族中的统治者。如庄蹻入滇后“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庄蹻的后代亦与当地民族融合而成为大姓。又如大姓雍闾、吕凯本是汉族豪民的后代，但他们亦称“耆帅”、“豪率”，同当地夷帅的称呼一致，已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大姓中亦有称“方土大姓”的，即土生土长的大姓，如建宁令爨习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显然是汉化了的当地民族统治者。夷帅和大姓之间还用“联姻亲”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使大姓和夷帅更难以区别。

夷帅大姓在东汉至三国时已具有较大的势力，在两晋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据记载南中的建宁、云南、兴古、牂牁四郡就有“焦、雍、娄、爨、孟、董（董）、毛、李”等八个大姓^①。其中爨氏最强大。爨习在刘璋时曾为建宁令，爨肅曾仕魏为尚书仆射、河南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4，成都，巴蜀书社，1984。

^②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4，成都，巴蜀书社，1984。

尹^②。可见爨氏有很大势力，后来爨氏大姓又有爨深、爨龙颜、爨翫、爨宏达等。到公元5世纪末爨氏势力控制了云南大部分地区。孟氏势力仅次于爨氏，势力较大的还有朱提、建宁等郡的孟琰、孟获、孟干、孟通等大姓。雍氏的代表人物雍闿在蜀汉时发展成南中势力最大的大姓。李氏大姓有李恢、李俊、李松等。除八个较大的大姓外，在南中地区还有牂牁郡的朱褒势力最强，曾做过牂牁郡丞、朱提太守。永昌郡大姓以吕凯、王伉势力最大。这些大姓曾在三国时利用中原分裂混战的机会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拥有大量土地和占有部曲为私家武装，盘踞一地，形成一个地方的实权统治者。雍闿就曾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①为理由，并依靠吴国发展自己在南中的势力。吕凯则采用据永昌抗雍闿以取得蜀国的支持，依靠蜀国发展自己的势力。正因为有大姓雍闿的抗蜀，故引发了蜀丞相诸葛亮的“南征”。诸葛亮“南征”后不仅没有彻底打击南中大姓势力，反而采取了“南抚夷越”的政策，利用和支持大姓，使“南征”后30余年中大姓势力发展壮大，成为两晋时期南中割据纷争的地方势力。两晋时由于晋朝不顾大姓的实际情况，对夷帅大姓施加种种压力和限制，夺取大姓部曲，侵犯大姓和夷帅的利益，结果导致公元302年以后大姓、夷帅与晋朝长达半个世纪的争权夺利的斗争，造成许多大姓纷纷割据一方，自称太守，到东晋永和三年（347），晋朝在南中的统治彻底失败，爨氏大姓称强，南中的统治大权落到爨氏大姓的手中。

二、南诏与大理

（一）南诏

在公元7至9世纪，西南民族地区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由彝

^①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4，成都，巴蜀书社，1984

族先民为统治民族建立了南诏国^①，传世 13 代，历时 274 年之久，基本上与唐朝相始终。由于南诏国地处西南边疆，处于唐蕃之间，因此在西南边疆形成了唐、诏、蕃三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纷争局面。

1. 南诏国的建立

约在 6 世纪末 7 世纪初（隋末唐初），在滇东爨氏逐渐衰落的时候，滇西洱海地区的乌蛮、河蛮的社会经济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乌蛮发展更快，并在洱海地区形成了六个强大的奴隶主集团，史称六诏。“南诏……自号六诏，曰蒙嵩诏、浪穹诏、越析诏、遣（邓）贖诏、施浪诏、蒙舍诏。”^②六诏中蒙舍诏位于诸诏之南，故称南诏。南诏经舍龙、细奴逻父子的经营其势力大增，成为六诏势力最强的一个诏。

公元 7 世纪初唐朝建立后，曾大力经营西南民族地区，在西南民族中广泛地推行羁縻州县制。到公元 7 世纪末，正当唐朝积极经营洱海地区时，西南边疆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吐蕃势力强大起来，并不断向西南扩展。向南，即向云南洱海地区的扩展直接影响到唐朝在云南的统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之下，唐朝便决定扶植与唐朝关系最密切在当地最雄强的蒙舍诏统一六诏，使之既能控制洱海地区的局势，又能遏制吐蕃势力的南下，减轻吐蕃对唐朝西南边疆的压力。

从 734—737 年（开元二十二至二十五年）唐朝出兵协助南诏进行统一洱海地区的活动。唐朝又派御史严海与南诏王皮逻阁一起制订了统一各诏各部的战略。从 734 年起先后攻占了石和城（今云南省凤仪县）、石桥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太和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太和村）、大釐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控制了原西洱河各部。接着又打败了浪穹诏、施浪诏、邓贖诏以及宾川、剑川等地的各个奴隶主集团，同时皮逻阁又用和平方式统一了蒙嵩诏。至此，

关于南诏国由谁建立的问题史学界认识有分歧，有的认为是彝族先民建立的，有的则认为是白族先民或其他民族所建，多数人认为是以彝族先民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政权。

^② 《新唐书·南诏传》，卷 222 中。

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完成了统一洱海地区各部的使命。

在皮逻阁统一六诏以后，唐朝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九月，封西南大酋蒙归义为云南王”^①。唐朝对皮逻阁的加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

南诏国建立后不久便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疆土战争，首先利用滇东爨氏与唐朝的矛盾兼并了滇东爨区。接着又出兵攻占了唐朝所设的姚州都督府，然后北上攻取了唐朝嵩州（越嵩）之地。以后又北攻吐蕃、西开寻传、南征茫蛮和安南都护府，东攻黔中。南诏经过从皮逻阁到世隆期间的不断扩张，其疆域最强盛时“东距爨，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大渡河以南），东北黔巫”^②。成为唐朝西南边疆的强大政权。

2. 南诏国的政治军事制度

南诏国境内有众多的民族，南诏政权的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行政上的长官往往同时又是军事首领。其中央与地方制度，均仿唐制而依据南诏特点加以变通。

中央政权机构：

南诏政权的最高政治、军事统治者是南诏王，由原蒙舍诏蒙氏贵族世袭。中央协助南诏王处理军政大事的是清平官和大军将，清平官 6 人，大军将 12 人，“清平官六人，每日与南诏（王）参议境内大事”^③。“大军将一十二人，每日见南诏议事”^④。

南诏国中央政权机构最初是设六曹，后改设九爽。曹长由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六曹是：兵曹主兵，户曹主户籍，客曹主礼宾外交，刑曹主刑法，土曹主官人，仓曹主财政。南诏中期以后将六曹改为九爽，九爽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手工业），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

《新唐书·南诏传》，按：蒙归义即第一任云南王皮逻阁。

② 《新唐书·南诏传》卷 222 上。

向达：《蛮书校注》，卷 9，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④ 向达：《蛮书校注》，卷 9，北京，中华书局，1960。

禾爽主商贾^①。凡属南诏王与清平官、大军将议决的军政大事都交由六曹（或九爽）有关部门实施。

地方行政机构：

南诏国地方政权机构因各地经济文化的差异和民族的不同，分别设立各种不同的行政机构。在南诏统治中心经济文化发达的洱海地区设“十睑”，“夷语睑若州”，如唐制的州；睑之外设节度，共设六个节度。六节度是：弄栋（治今云南省姚安县），永昌（治今云南省保山市），银生（治今云南省景东县），剑川（治今云南省剑川县），柘东（治今云南省昆明市），丽水（在今伊洛瓦底江上游两岸）。另设两个都督：会川（治今四川省会理县），通海（治今云南省通海县）。节度使和都督均由南诏王直接任命，节度使和都督既行使地方行政权，又具有军事权，是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南诏军事制度实行常备军和服兵役制。南诏国有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军队数额不固定，根据战争的需要随时增减。《蛮书》云“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779年（大历十四年）异牟寻与吐蕃合兵攻唐朝西川边境一战却出动大军20万。按规定南诏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南诏军队分为三种，一是乡兵，是村社的壮丁。平时为农，战时为兵。每到农闲之时，乡兵要进行严格的训练，每年十一—十二月，还要检查训练的情况，“农田收获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城邑村谷，各依四军，集人试枪剑甲冑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②。二是常备军，是从乡兵中选出的优秀者，是南诏军队的核心。三是境内各民族的武装，是从各民族中征调来的，是南诏军队重要来源之一，大多数能征善战，故每战必使其充任前驱。南诏王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军事编制以乡兵为主，按照居地远近，编为东西南北四军，每军置一将，统率1000人或500人。统帅四个军的军官称为“军将”。因各地人口不均，所编的军也多少不等，所以管军之府有大府、中府、下府、小府（有似唐朝的府兵制）的区别。南诏军队出兵征战

^① 《新唐书·南诏传》卷222上。

^② 向达：《蛮书校注》卷9，北京，中华书局，1960。

时，以 2500 人为一营，每个士兵需自带粮食，因而多数战速快。南诏军队虽强，但却不能持久作战，这是南诏军队致命的弱点。同时南诏为解决军队供养，又规定军行出境允许士兵劫掠以供军需，故这种军队对战地的破坏性极为严重。

3. 南诏国的经济文化

南诏时期是云南经济文化中心由滇池地区西移洱海地区时期，在南诏政治发展的同时，经济文化也有较快的发展。由于南诏统治区域广大，民族众多，因而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发展较快的滇池、洱海地区已有封建经济的萌芽，而发展较慢的偏远山区民族则处于原始落后的阶段，但从总体来说南诏还是奴隶制经济占主导地位。

在南诏统治区内，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力、奴隶皆归南诏王所有，再分封给南诏各级奴隶主占有。将占有的土地划分为若干区域（即庄园），归所在城、镇政府官吏经营，地方官吏派田官管理，田官又派“监护”催促强迫佃人（奴隶）进行劳动生产，产品“收刈已毕，蛮官（田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①。生产者——佃人的劳动产品只能得到仅够维持最低生活的粮食，其余全部归奴隶主所有，这种生产关系称为南诏佃人制——奴隶制生产关系。

尽管南诏实行的是奴隶制生产，但在整个南诏时期，其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农业、手工业、商业生产水平都较高。在农业生产方面粮食作物品种繁多，史载当时滇东、滇中、滇西地区的农作物有稻、麦、豆、麻、黍、稷等，五谷品种齐全。农耕技术也较高，水田每年水稻一熟，再复种小麦。耕作方法是采用“二牛三夫”耕作法：“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②《蛮书》曾对南诏农耕技术作过很高的评价：“蛮治山田，殊为精好。”这是对南诏农耕技术的概括。南诏的畜牧业也是

^① 向达：《蛮书校注》，卷 7，北京，中华书局，1960。

向达：《蛮书校注》，卷 7，北京，中华书局，1960。

“六畜兴旺”。据《西洱河风土记》云：“畜有牛、马、猪、羊、鸡、犬。”《蛮书》亦云：“畜有猪、羊、猫、犬、骡、驴、豹、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南诏所产马当时已闻名全国。南诏的园艺种植也较发达，“南俗务田农医菜圃”。菜蔬类有“葱、韭、蒜、箐”等；水果有桃、梅、李、柰、荔枝、槟榔、诃黎勒、椰子、柑橘、甘蔗、橙、柚、梨、杏等。经济作物种柘树养柘蚕。此外，种茶业也有一定基础，银生节度辖区产茶很多，后来发展成普洱茶的基地。

南诏的手工业生产水平也较高，尤以金属冶炼和铸造著称。南诏境内丽水产金，会同川产银，并用金、银制造器皿、装饰品，还用黄金铸成纯金佛像。冶铜业很兴旺，所炼之铜大多用于制造佛像和铜钟。丰祐（823—859）重修崇圣寺三塔时就用4万斤铜铸造佛像1万余尊；崇圣寺有871年（南诏王世隆建极十二年）铸造的铜钟，此铜钟直径丈余，厚一丈，钟声可传80里，足见其铸铜技术之高。南诏的冶铁技术很高，南诏军队使用的武器皆为铁制品，最著名的有铎鞘、郁刀、南诏剑等。铎鞘产自丽水，状如刀戟残刃，其锋利“所指无不洞”。南诏冶铁铸造技术之高还可以从建在金沙江上的铁索桥和“南诏铁柱”反映出来。现存弥渡县蔡庄铎柱庙内的“南诏铁柱”高3.30米，圆周长1.05米，铸于872年（南诏王世隆建极十三年），分五次铸造，然后再连接在一起。^①南诏纺织业以丝织品为主。柘蚕抽丝，精者纺丝绫或织锦和绢，织成染色后成为上服。南诏纺织业在大和三年（829）以后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原因是南诏将在成都等地所俘获的有技术的汉族工匠与南诏手工业者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汉族工匠传授了先进的纺织技术，“南诏自是文工织与中国埒”^②。其纺织技术水平已和内地一样了。南诏的煮盐业很发达，安宁、泸南、昆明城（今四川省盐源县）、剑川、丽水、银生都有盐井。南诏还设官管理盐业，制定了煮盐、销售的法令。

陈润圃：《南诏铁柱辩证》，载《文物》，1982（6）。

^② 《新唐书·南诏传》，卷222中。

“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①。

由于南诏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用于交换的产品也增多了，从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南诏后期还增设“禾爽”专门管理贸易。南诏不仅与四川、广西、西藏等地进行贸易，对外还与东南亚及波斯、大秦都有贸易往来。南诏通往国外的商业交通线就有四条。还形成许多商业城镇，如阳苴咩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喜洲）、柘东城（今云南省昆明市）、永昌城（今云南省保山市）、铁桥城（今云南省丽江塔城）、银生城（今云南省景东县城）等。交换的产品有金、琥珀、麝香、食盐、茶以及荔枝、槟榔、波罗密、青木香和多种畜产品。“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黄金既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又作为货币流通，同时亦用缯帛和贝作为货币。

南诏文化，以其文学、建筑绘画、音乐舞蹈最为突出。南诏文学以诗歌和散文著称。其诗歌、散文受内地文学影响甚深，故南诏文学多具有唐代文学的风采。南诏王及其子孙、官更多习汉文，读儒家之书，“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南诏涌现出许多的诗人和文人，许多诗文传到内地，有的被收录到《全唐诗》、《全唐文》中。南诏王寻阁劝就是著名诗人之一，他的《星回节游避风台》一诗颇具唐诗风格，被千古流传。南诏官员中也有不少的诗人，如清平官段宗义、董成、赵叔达、杨奇鲲等，其诗颇具唐诗韵味。董成的《怀乡》、杨奇鲲的《岩嵌绿玉》等诗都被收录在《全唐诗》中。南诏的散文造诣亦极高，最著名的代表作有《南诏德化碑》，碑文颇具唐代散文大家的风采。其优秀佳作还有唐大中初年质问唐朝为何减少就学成都子弟人数的呈词，其中有“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之有费”等句，就连唐朝接呈的官员开读后都有“开缄捧读，词藻斐然”的感叹。^②

^① 向达：《蛮书校注》，卷 7，北京，中华书局，1960。

王说：《唐语林》，卷 2，载《云南史料丛刊本》，第 31 辑，云南大学历史系编，油印本。

南诏建筑以佛教寺塔和宫殿建筑艺术水平最高。寺塔建筑以崇圣寺三塔最著名，建成于唐开元年间。寺基方 3.5 平方公里，有塔 3 座，房屋 890 间，佛像 11400 尊。大塔（又称千寻塔）有 16 层，高 69.13 米，是中国古塔中层数最多的，也是中国古代最高的塔。塔基为正方形，全用砖砌成，四面开有塔门，塔身中空，可登梯上塔顶。塔身东、西正中各有佛龕，内供石佛。塔顶有刹，由中心柱、宝顶、宝盖、相轮和莲花座组成。南诏宫殿建筑壮观华丽，以南诏王大衙门建筑技术最高。宫殿楼高 6.7 米，以青砖为磴，楼前广场 1 平方公里，南北城门相对，经三重门方到大厅，大厅高 3—4 米。大厅两旁“重屋别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是小厅，即南诏王的住宅。宫殿还建有客馆，馆前有亭，亭临方池，池“周回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①。如此宏伟壮丽的建筑反映了南诏建筑水平之高。

南诏的绘画艺术集中体现在《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之中。此画成于舜化贞中兴二年（899），内容描述了南诏历史和神话传说的片断，图文并茂，是一幅既具有绘画艺术又具有研究南诏历史的重要文物，被誉为“南诏瑰宝”。

南诏的音乐舞蹈以宫廷音乐最为丰富多彩，它是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内地和东南亚音乐而形成的，故南诏宫廷音乐既有东南亚的“骠国乐”（后传入唐都长安），又有经唐朝传入的西域“龟兹乐”，还有南诏自身的“夷中歌曲”（即南诏奉圣乐），以及“天南滇越俗歌”和“盖罗缝赞普子”等乐曲。南诏民间还广泛流传“俗歌”、“俗舞”，最为普遍的是“踏歌”（打歌），以笙、笛等乐器伴舞，很受民间男女青年的欢迎。

南诏宗教信仰实行兼容政策。在南诏初期多信巫鬼，“开三教，宾四门”。南诏中期大乘佛教传入成为南诏的国教，到处普建寺庙，在劝丰祐时佛教达到鼎盛时期，“家知户到”，皆以佛教为首务。在南诏后期另一原始宗教——“本主”或“土主”在洱海白蛮中发展起来。所谓本主，有的是自然神的化身，如苍山神、洱海神；有的

^① 向达：《蛮书校注》，卷 5，北京，中华书局，1960。

则是图腾或祖先与有名将相崇拜，如白马、细奴逻、郑回皆被供为本主加以崇信。

4.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南诏是唐朝西南边疆的一个强大地方势力，对唐朝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唐诏之间有着极为微妙的关系。相互间恩怨和战，前后历经南诏 13 代王，近三百年时间。在南诏 13 个王中有 10 个王被唐加封，友好关系成为主流，然而矛盾和战争也不断出现，造成诏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观诏唐关系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南诏统一六诏前的和好时期。这一时期大约从第一代南诏王细奴逻至第三代王盛逻皮时，是南诏利用其远离吐蕃，不受吐蕃直接威胁的有利条件，依靠唐朝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势力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与唐朝友好时期。这一时期从南诏统一六诏至 750 年（天宝九年）。这是唐、诏互相都需要借用对方力量的时期，尽管双方的目的各异，不过友好对双方都有利，因而使诏唐友好达到第一次高潮。

第三个时期，背唐附蕃的矛盾冲突时期。这一时期大约从天宝战争至建中元年（780）。是南诏大力扩张，但受到唐朝的控制，因而产生矛盾发生战争，最后南诏投靠吐蕃的时期。

第四个时期，重新和好的时期。这一时期是诏唐关系由恶化向和好转化的时期，大约从 780 年至 828 年。

第五个时期，诏唐和战并举时期。大约从 828 年至南诏灭亡。这一时期诏唐因各自利益处于时和时战的局面。

附南诏王世系表。

南诏王世系表

世次	书名	蛮书	新唐书	南诏野史
	人名			
一世		舍龙	舍龙	舍龙（龙迦独）
二世		龙独逻（细奴逻）	独逻（细奴逻）	细奴逻
三世		逻盛	逻盛炎	逻盛炎（逻晟）